
“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读三卷本《董健文集》有感

江萌 胡星亮¹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董健自 1978 年以来的学术之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 从“天亮而梦未醒”走来, 而去追寻“真理的阳光”; 中期, 确立从人与戏剧和文学现代化的总趋势去研究 20 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的学术追求; 后期, 则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渗透, 有思想的人文学者和作为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结合。贯穿三个阶段的主线, 是董健坚持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 在学术之旅中追求真实, 追求真理。

【关键词】: 《董健文集》 现代意识 启蒙理性 人文精神 真实/真理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7)04-0056-08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的“董健学术思想暨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传统研讨会”上, 董健先生反思了自己在极左年代失去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状态, 认为这种状态使知识分子离开了真实, 离开了真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今年是“文革”爆发 50 周年, 也是这场劫难结束 40 周年, 在这个重要节点上, 董健先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红色思维”年代我们离开了真实, 也就是离开了真理有多远! 近读三卷本《董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具体感受到了董健先生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思想脉络, 也看到了作者在这种追求中所遭遇的种种压力, 尤其是极左势力对他的压制。例如从文集第三卷《我与许家屯二三事》一文中, 就可以看到上世纪 80 年代在“反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 董健先生因为发表文章批判极左思潮而被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封杀”的情形。由此可见追求真实、追求真理之艰难, 更可见追求真实、追求真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和可贵。

—

董健先生是著名戏剧学家、文学史家、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著述丰硕, 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先后出版《陈白尘创作历程论》(1985)、《田汉传》(1996)、《戏剧艺术十五讲》(2004)等学术专著, 领衔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中国当代戏剧史稿》(2008)、《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2003)、《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2013)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005)等著作, 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董健文集》没有收录上述学术著作, 主要选编了董健 1978 年开始正常学术研究以来撰写的单篇文章^[1], 按学科领域分为戏剧研究、文学评论、文化批评三卷, 同样体现出他不断探索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评判, 不断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思想脉络。

董健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 被学术界

¹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12JJD75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江萌, 女, 江西彭泽人,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胡星亮, 男, 浙江淳安人,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誉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一套重要著作,它包含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的种种思考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整体描述和剧目梳理,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戏剧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这四本书所构筑完成的宏伟的文化工程,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百年来戏剧史、文学史的研究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它在学术思想上的高度,研究规模上的广度,以及研究成果上的丰富性、系统性和扎实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难以整体超越的。”^[2]《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是董健在1980年参与撰写、统稿、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之后,再起炉灶、重新主编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学术界评论此著“最突出贡献是动态地呈现了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与复杂内涵”,它“抛弃了以社会政治转型为本位的政治优先原则,也抛弃了‘去政治化’的‘庸俗技术主义’原则,立体地凸显文学的审美生成的动力机制与变异模式,对于文学发展的延续与转折进行更加贴近文学本身的动态描述,巧妙地揭示了制约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复杂关系”^[3]。这些著作有力地推进、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戏剧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董健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尤其在田汉、陈白尘研究上作出的深刻而独到的贡献,同样为学术界所公认。他赞颂田汉是真正的“时代之子”,其创作把国气与民心融入自己的灵魂,在田汉曲折的艺术生涯中,挖掘出其独特的戏剧精神与人格魅力:富有现代民主意识、属于人民大众的“在野”精神,充溢着艺术“慕道者”“殉道者”傻气的苦干精神,崇诚、唯善、求美而又天真、幼稚和迂阔的诗人气质^[4]。这是对田汉及其创作的深刻把握。董健不仅对人们熟悉的田汉话剧创作有深入分析,而且对人们常常忽视的田汉戏曲创作的艺术成就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他把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戏曲改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上:他赋予了近二百年来在文学性上渐趋贫困化的京剧以表现现代意识的文学生命;他初步扭转了京剧‘重戏不重人’的旧习,开辟了人物塑造的新路子;他结束了旧京剧只有演员没有作家的历史。一句话,田汉使只重唱腔、表演而无文学,只重技艺而无意识的畸形的旧京剧开始向更健康、合理的戏曲转化。”^[5]可以看出,透过田汉创作的“魂”与“神”,董健着重在思考和探索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进程。在陈白尘研究中,同样包含着董健对于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他不仅分析了随着社会发展和作家的艰辛探索,陈白尘创作的时代品格、历史品格与喜剧品格、美学品格如何逐渐完善,对其重要作品尤其对以《升官图》为代表的喜剧艺术的论述见解独到,指出陈白尘喜剧创作的重要艺术价值和悠深的艺术生命力;进一步,他从陈白尘创作中发现喜剧具有独特的审美穿透力而执著地呼唤喜剧精神,从陈白尘创作的“刺官”意识(批判官僚政治的民主精神)、人文思想(反对市侩主义的坚贞自守精神)和对于自由的执著追求(抨击封建专制而张扬个性解放)^[6],感受到“五四”戏剧和文学的精神力量。

董健曾担任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为南京大学文科发展和中国语言文学,尤其是戏剧影视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健早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新时期之初,由于南京大学要延续吴梅、卢冀野、陈中凡等以来悠久的戏剧研究传统,其教学和科研重点开始转到戏剧方面来。他在陈白尘、钱南扬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南大戏剧影视学专业建设,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等层级完整、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继承并弘扬南大戏剧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深化学科领域和内涵建设,使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始终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南京大学培养的戏剧影视学博士、硕士,不仅已经成为全国该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且其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南大特色”。以现当代戏剧为例,董健强调现当代戏剧研究要补课,“第一要补‘现代意识’的课,第二要补科学的‘戏剧学’的课,第三要补‘戏剧史科学’的课”^[7]。由此形成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鲜明的风格特色。这种风格特色首先体现为董健领衔主编的两本戏剧史稿的精神灵魂:《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由于把现代意识和启蒙理性作为阐释中国现代戏剧的价值评判,因而成为“中国大陆最早论说中国戏剧现代性问题的学术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8];《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坚持以‘现代性’为分析视点,对中国当代‘戏剧启蒙理性的消解与重建,或者说戏剧现代性的残缺与修复’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总结,丰富的叙述内容和精到的剧目分析使它成为一本研究当代中国戏剧的重要著作”^[9]。如此学术精神影响到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这个学术群体的戏剧研究,并且通过他们又影响到一届届年轻的博士和硕士,从而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界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南大学派”。著名美学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功正先生在多次参加南京大学戏剧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以“启蒙精神,价值评判,现代批判意识,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准确概括了这个学术流派的精神内涵。

不难看出,无论是作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对田汉、陈白尘等中国现当代作家做出深

刻而独到阐释的杰出研究者,还是作为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卓越的学科带头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董健坚守着“五四”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评判。正是坚守着这种学术精神,董健才能够对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做出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和理论阐释,对困扰着当下中国戏剧和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二

董健先生 1978 年以来的学术之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天亮而梦未醒”走来,而去追寻“真理的阳光”;中期,确立从人与戏剧(文学)现代化的总趋势去研究 20 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的学术追求;后期,则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渗透,有思想的人文学者和作为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结合。贯穿三个阶段的主线是董健先生坚持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在学术之旅中追求真实,追求真理。

虽然 1965 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但董健先生学术之旅真正进入正常发展期,开始于 1978 年。1978 年至 1984 年前后,可以看作是董健先生新时期以来学术之旅的第一期。

这一阶段董健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批判极左思潮、教条主义长期以来对文学、戏剧的种种束缚,寻找学术研究的“真理的阳光”,努力用真理的阳光“照亮”自己因长期受左倾教条束缚而愚昧、混沌的头脑。这些研究对过去有重大突破,然而对于董健先生的学术理想和追求来说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学术观点尽管多有创新,但渗透于其中的思想理念、文化价值标准还没有彻底改变。与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拨乱反正的情形相似,他此期的学术研究也处于新旧转型阶段:从“天亮而梦未醒”走来,而去追寻“真理的阳光”。

董健生于 1936 年,到 1978 年已年过“不惑”。然而他 1956 年考入大学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政治运动、体力劳动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中度过的;留校任教后又逢“文革”十年,整个社会的动乱、愚昧更使他踏上了精神蒙蔽奴役之路。该上的课没有上(或不准上),该读的书没有读(或不准读),该学会思考时不会思考(或不准思考),所以尽管 1978 年他已年逾“不惑”,但他感到思想上仍然困惑。董健先生把这种当时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称作是“天亮而梦未醒”状态,是 1978 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伟大运动,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启蒙的“真理的阳光”,也让这位当时在江苏省颇有名气的“笔杆子”,这位凭其天赋此前常被“重用”而“狂”过的青年教师,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知识的残缺,由衷地感慨自己“是建国后大学教育的大锅里煮出的一碗‘夹生饭’”^[10]。于是,他开始读书“恶补”,着重在思想启蒙、知识结构两方面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各种经典著作。

董健先生在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课题:一是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十所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撰稿并担任主编之一,二是撰写专著《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深入探讨而形成的一批论文,如《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成就和败笔》《论 1956 年至 1957 年中国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论〈红旗谱〉的艺术价值和该书一九七八年版修改本的失当》《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陈白尘创作历程简论》《〈升官图〉和陈白尘的喜剧艺术》等等。

学术研究要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要有敏锐精深的艺术分析,尤其要有“真理的阳光”的穿透力,上述论著,清晰地体现出董健先生在这一阶段不断摸索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董健先生此期的学术研究仍然有束缚。比如,对历史发展还遵循“阶级斗争红线”观,对农民起义还少有深刻的思索和批判,对“十七年”中国社会和文艺的认识有时还依从主流。但是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他以“思想解放”批判左倾教条与封建传统合流及其对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戕害,强调作家作为精神创造者的独立人格和艺术独创,强调文学创作的人道、人情与人性内涵,强调文学研究要从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去分析作品描写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等等,可以看出,董健先生正努力挣脱种种束缚而去追求真正的学术研究。

三

董健先生真正挣脱长期以来的左倾教条束缚,而建立和完善其学术研究的思想理念与文化价值标准,并形成其独特的学术风格、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在1984年前后至1990年代后期。具体地说,是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与陈白尘先生共同主编)、《田汉传》二书和《关于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几个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戏剧卷〉导论》《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田汉论》《南国社述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脸谱的消解与重构》《找回历史感——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为标志,构成他学术之旅的第二期。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是国家重大社科项目。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运动和思潮,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重要剧作家的创作,阐释了戏剧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了其中值得记取并令人深思的经验教训。此书作为教材在许多高校使用并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参与此书的撰写并担任主编,董健先生的学术研究就从早先的作品论、作家论和思潮论,逐步、扎实地扩展到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史,这是一次飞跃。更重要的是,该书在撰写中遭遇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冲突,而在夏衍、陈白尘等老一辈戏剧家启蒙精神的引导下,编写组坚持了现代、科学、人道、民主等价值观念。这保证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使主编之一的董健先生在前一阶段思想解放基础上,不断启蒙,深入思考,在思想精神和学术探索两方面都有重要突破和升华。

《田汉传》在董健先生学术之旅中是又一次重要超越。田汉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在他身上,最典型、最突出地体现着中国现当代戏剧及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精神特质。写作《田汉传》,董健跟随田汉更深入地走进“五四”,走进20世纪的中国。在详尽史料的基础上,《田汉传》以历史和细节的真实呈现田汉真实的灵魂,展示田汉的艺术个性和人格力量,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田汉。它作为田汉研究中最有份量的著作而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作者赞颂田汉是真正的“时代之子”,其创作把国气与民心融入自己灵魂之中,他在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无人可与之比肩、无人可以替代的。作者在田汉复杂曲折的艺术生涯中,进一步挖掘出其独特的戏剧精神和人格魅力:富有现代民主意识、属于人民群众的“在野”精神,充溢着艺术“慕道者”“殉道者”傻气的苦干精神,崇诚、唯善、求美而又天真、幼稚和迂阔的诗人气质。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注重在传主真实的“魂”与“神”中,去思考和探索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进程。

董健先生此期的其他学术论文,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田汉传》上述思考的发挥或深化。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董健先生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索。

首先,董健先生强调20世纪中国戏剧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是它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强调中国戏剧转型的根本标志是“现代性”追求,它推动中国戏剧面貌一新地汇入世界戏剧潮流。在中国现代戏剧及文学研究界,《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较早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性”“现代意识”概念。此后,“现代性”就作为20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的精神特质,成为董健先生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价值评判。它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了20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的根本和实质,使其学术研究充溢着深刻的思想力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其次,董健先生强调20世纪中国戏剧的生态格局已从传统的“戏曲”一元结构发展为“话剧(及新歌剧)一戏曲”二元结构,并且认为,话剧在此艺术生态构成中引领着戏剧发展的新潮流。戏剧界至今还有不少人人仅仅把话剧看作是中国数百个剧种之一,看不到话剧与众多戏曲剧种在戏剧观念、艺术价值、美学体系上的根本差别,遂导致对中国戏剧现代理解之盲目性。董健先生此论述对于人们正确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的生态结构和推进中国戏剧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董健先生强调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着重表现为精神内涵的现代意识。他认为戏剧应该提供审美的“艺术享受”,但更强调戏剧的“精神内涵”,强调通过戏剧实现人在精神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以沟通人的生活体验并帮助人养成健全的现代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肯定了体现着历史要求、代表着戏剧新观念的话剧在中国戏剧转型中的地位与价值,认为话剧为主体所张扬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五四”所创立的现代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是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意识的核心内容。

戏剧发展的现代性追求,戏剧艺术生态的“话剧—戏曲”二元结构,戏剧精神内涵的现代意识,就是董健先生对于 20 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认识和独特而深刻的阐释。

这一阶段董健先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要从人与戏剧(文学)现代化的总趋势去研究 20 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这给他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宏阔的视野,一个深邃的精神空间。董健先生在大学读书时就非常崇拜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历了新时期思想解放伟大运动,他更是立志做一个会思考、有思想的学者。他的这种学术理想在 1984 年前后完成“转型”并得以实现。此时,董健先生对 20 世纪中国戏剧及文学了然于心,其思想启蒙和独立思考臻于成熟,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思想艺术分析精深老到。他于博览古今基础上的精思著述、立论兴说,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界已成大家和权威之言。

四

1996 年写完《田汉传》,董健先生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之中。反思根源主要有二:首先,他对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戏剧、文学发展现状感到极为不满。那么自己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能够做些什么呢?其次是《田汉传》写作对他心灵的震撼,因为田汉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魂”与“神”也是董健先生孜孜以求的。那么自己真正做到了吗?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对他更是深深的触动。“思之再三,觉得自己身上最缺乏的就是使读书之士的脊梁骨坚硬起来的一种‘钙’——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当然包含着董健先生的自谦。但是,他确实是以最大的真诚去追求这种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并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能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11]。

于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董健先生一方面仍然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戏剧与文学的研究,而另一方面,他又努力使自己成为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良知。后者就是收集在《董健文集》第三卷中的文化批评文章。它们构成董健先生学术之旅第三期的突出特点。

直面社会和文化转型中的物欲横流、精神萎缩,董健先生坚决捍卫“五四”现代性传统,张扬启蒙理性,强调人文学者要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探求真理的精神,要勇于追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因此,董健先生此期的学术研究着眼于当下,并且明显地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渗透,有思想的人文学者和作为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结合。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与丁帆、王彬彬共同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与胡星亮共同主编)、《戏剧艺术十五讲》(与马俊山合著)等著作和《论中国当代戏剧中的反现代倾向》《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论中国当代戏剧启蒙理性的消解与重建》《〈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戏剧卷〉导论》《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等论文。这些论著,其阐释框架和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董健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戏剧的深刻思考,强调要把当代文学和戏剧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其价值评判标准“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这就摆脱了此前学界出现的为制造虚假繁荣或美化历史缺陷的“历史补缺主义”的束缚,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乱或颠倒的“历史混合主义”和撇开思想内涵而仅着眼叙述、结构、语言层面的“庸俗技术主义”等不足抛弃,牢牢把握住中国当代文学、戏剧的发展,是“五四”启蒙理性与现代意识从淡化、消解到重建,文学和戏剧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定位,极大地拓展、深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戏剧史研究。

不难发现,董健先生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现代性追求。此期他更加强调启蒙理性,或是把启蒙理性视为现代意识、现代性的核心。他认为“五四”精神就是现代启蒙主义精神,而由于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五四”精神并没有在中国落户,所以中国文化、文学和戏剧的发展要重返“五四”起跑线,要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核心的科学、人道、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要补启蒙的课。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出现诸多“新论”要否定“五四”、解构启蒙,进而否定中国戏剧、文学的现代性追求,这更激发起董健先生维护“五四”、坚持启蒙的学术激情。而无论是早先注重现代意识,还是此期着眼启蒙理性,它们都使董健先生的学术研究充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

而如此启蒙理性中所贯注的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同样体现在董健先生这一时期撰写的、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文化批评文章

之中。那么何谓“启蒙”呢?董健先生从西方表达 Enlightenment 意为“照亮”,中国古代“祛蔽启蒙”和近代“开启民智”之说,指出“启蒙”在现代可理解为:“把人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来,从被束缚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之融入个性有自由、国家有民主,这样一种和谐的现代文明,‘人’成为现代之‘人’,‘国’成为现代国家。”^[12]正因为启蒙的要义是“立人”——人的现代化,故强调启蒙理性,与他早先所张扬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他写了《启蒙理性视角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阻挠人的现代化》《两种文化心态与两种“中国化”》《“五四”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人文”不可无“文”》《略论周有光的文化观》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左倾教条主义、新市侩主义,以及后现代、后殖民、新左派、新儒学等等。以“现代”面貌反对现代化潮流的文化复旧,使整个社会文化虚假平庸,国人精神疲软,学界众语喧哗但缺少历史感和现代价值评判;他写了《失魂的大学》《“立人”为大学之本》《再说失魂的大学》《春末随笔》《教育忧愤录》《“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等文章,批判教育腐败、大学失魂,指出教育缺乏独立、学术缺乏个性、思想缺乏自由,使人的精神空间日趋逼仄,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逐渐衰微;他写了《慎言“精品”二字》《“创作”与“操作”》《戏剧评奖与“趣味的腐化”》《“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流行影视剧对公民意识的颠覆》《跪着献艺与站着演戏》《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等文章,批判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的压抑、戕害使作家、艺术家失去人文主体性,戏剧和文学没有人文、精神萎缩;同时,在《告别“花瓶”情结》《学会思考不易》《在发昏发狂的日子里》《我与许家屯二三事》《彷徨在“红”与“白”之间》《一碗“夹生饭”及其回炉的尴尬与苦恼》等文章中,他也严厉地剖示自己过去及现在“奴在身”“奴在心”的精神状态。董健先生这些文章以其真诚的人格、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揭示而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激烈反响。正如沙叶新所说:“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心怀感动。”^[13]

五

于是我们看到,董健先生,这位年轻时就“一心想攀登山顶去摘学术之果”的学者,在新时期思想解放伟大运动推涌下,立志“成为一个会思考、有思想的真正的学人”^[14],不断突破长期以来左倾教条倾向、政治实用主义有形或无形的束缚,不断探索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评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有力地推进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及文学的研究;我们看到董健先生这位著名的戏剧学家、文学史家,在年逾古稀之后,敏锐关注社会文化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进行深刻思考,以其犀利的文笔展开尖锐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

由于20世纪以来政治行动导向型启蒙与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尖锐矛盾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交错发展的复杂情形,也因为存在着封建传统、现实政治、物质金钱等对人的异化,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和文化缺乏丰盈的启蒙理性、精神价值和人文关怀、理想诗情。这就首先需要继续坚持“五四”现代启蒙精神,包括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关注,批判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批判束缚人、奴役人的各种异化现象,探求价值、人性和精神的重建,以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董健先生的戏剧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把董健先生的学术之旅放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谱系之中,其思想个性和学术文章又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应该说,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像董健先生这样立志“成为一个会思考、有思想的真正的学人”,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或展开思想启蒙的学者不在少数;而进入1990年代,因为社会政治、学术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情形发生了明显的、重大的变化。原先那些注重现代启蒙的学者,大都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而进入书斋,并且其学术研究本身也变得贫困,不再有思想的锋芒而更多成为形式、技术的阐释。董健先生的学术道路却恰恰与之相反。这位1980年代更多在书斋中追求“会思考、有思想”的学者,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一方面仍然追求“有思想的学术”,而另一方面,他又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以其富有批判性、前瞻性的社会文化批评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董健先生始终以最大的真诚和努力去追求先贤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现代启蒙主义,坚持人类普适价值,追求真实,追求真理,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贯穿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这样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是社会的良心,“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他们是人类和社会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一方面根据人类的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人生中那些丑陋腐败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人类基

本价值的充分实现。真正的大学问是离不开历史责任和现实关怀的,它充分展现了董健先生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在“董健学术思想暨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传统研讨会”上,董健先生发表的题为“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的感言,其核心思想就是“求真”。他强调“追求真实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正如绝对真理我们难以把握到一样,完全的真实我们似乎也难以追求到。但是,我们要永远走在追求绝对真理的道路上,追求到了几分真实,我们就追求到了几分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此乃真言至理,体现出董健先生作为著名教授、思想者和知识分子,其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集于一体的鲜明特点。人类近代文明在精神方面最突出的发展是科学,而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寻求真理,现代思想的最基本内核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五四”先贤胡适也曾经说过:“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权威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15]在董健先生对于社会历史、人类命运和学术事业的“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的深刻感悟中,贯穿着“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精神。

参考文献:

- [1]这些文章曾编为《文学与历史》(1991)、《跬步斋读思录》(2001)、《戏剧与时代》(2004)、《跬步斋读思录续集》(2006)、《启蒙、文学与戏剧》(2014)等学术论文集、文化批评集出版。
- [2]吴保和:《高扬戏剧现代性的文化工程——评南京大学的两本戏剧史稿与两本总目提要》,《戏剧艺术》,2014年第1期。
- [3]黄发有、林建法:《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 [4]董健:《田汉论》,《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另参见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 [5]董健:《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 [6]董健:《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白尘仙逝十年祭》《陈白尘〈听梯楼日记〉序》《跪着献艺与站着演戏》等文,《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 [7]董健:《现代戏剧研究要补课》,《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
- [8]马俊山:《评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 [9]吴保和:《高扬戏剧现代性的文化工程——评南京大学的两本戏剧史稿与两本总目提要》,《戏剧艺术》,2014年第1期。
- [10][14]董健:《学会思考不易》,《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242页。
- [11]董健:《告别“花瓶”情结》,《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 [12]董健:《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78页。
- [13]沙叶新:《序——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5] 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1930），《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00页。